

20世纪，科学史，转向，科学交流

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的一个“称呼”而已，如果用一个更朴实无华也更确切的说法，称其为“新方向”(new directions, 请注意英文“方向”一词为复数)要更恰当一些。

西方经济哲学的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从“大处”看，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在经济哲学中都有反映；更具体地说，实在论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哲学解释学、爱丁堡学派、“修辞”学派(the ‘rhetoric’ school)、话语分析等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哲学中都有反映，而著名学者马克·布劳格则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主张证伪主义方法论。

在经济哲学的研究中涉及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合理性问题、知识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制度问题、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问题、解释和说明问题、本文问题、话语问题、修辞学问题(郭贵春曾撰文论述了修辞转向在哲学中的重要意义，而经济哲学中对有关的修辞学问题，也有许多讨论)，以及许多科学社会学问题。

批判精神是哲学本质的体现。西方的经济哲学不但同西方“正统”经济学派展开了积极的对话，而且同西方的“异端”经济学也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西方学者把他们的经济哲学研究称之为“方法论”研究。最近几年，我国也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了经济哲学的研究。当前，我们必须大力介绍对许多国人来说尚属陌生的西方经济哲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更需要结合我国的情况大力开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但愿我国学者在经济哲学探索的无穷之路上能不断地有新的收获。

3-4

20世纪科学史的三次转向

N09

魏屹东
(山西大学)

20世纪是科学史的“英雄年代”，科学史研究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这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回顾科学史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同样规模的学科中，还不曾有别的学科像科学史那样有着如此广泛的发现和如此多的真知灼见，其发展的基本进程经历了三次转向。

第一、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写出第一部医学史到19世纪惠威尔写出第一部“科学通史”的漫长年代里，科学史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科史，写学科史的人几乎全是科学家而非历史学家，这样写出的科学史自然重人物和事件而缺乏历史分析。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将各学科史加以综合，不过这种综合说到底各学科史的汇集，各学科史间缺乏内在联系及必要的社会背景分析。孔德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主张统一的和综合的科学史，但实际上他的科学史是“哲学式”的而非“历史式”的。坦纳里受孔德的影响，主张科学史不仅仅是诸多学科史的集合，更要研究科学的社会环境、科学交流和科学教育等。受坦纳里的影响，萨顿担负起建立统一科学史的重任，用毕生心血写成巨著《科学史导论》和创办了第一份综合性科学史刊物ISIS(1912年)。他的科学史目标是将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和科学的观点及方法相融合的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实现了科学史从单一的学科史到综合的通史的转向。

第二、从内史到外史或思想史到社会史的转向。从学科史到通史并没有改变科学史的内史研究传统，即使萨顿的新人文主义虽强调了科学史的人文性，但仍以内史为主。与萨顿同时

库恩, 位置, 科学哲学, 哲学派别 (4)

代的夸雷更以内史研究而著称, 以他的“观念论”的内史风格影响科学史至今。但在 1931 年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 “一统天下”的内史传统受到了挑战, 原苏联科学史家黑森的“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科学史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原苏联的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和祖勃夫等也从社会经济角度审视科学, 外史研究逐渐兴起。美国的默顿 1938 年在 *Orisis* 上发表的长篇博士论文“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对外史的兴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被推崇为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英国的贝尔纳 1939 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 1954 年出版的《历史上的科学》标志着外史传统的成熟。1962 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问世, 以“历史主义”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外史研究。面对如火如荼的外史研究, 不少恪守内史传统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史“失去了科学味”; 也有不少科学史家认为外史顺应了科学的发展, 应大力加强。ISIS 第四任主编马尔特霍夫在 1978 年卸任时, 颇有感触地说“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件莫过于科学史由内史转向了外史”。

第三、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内史论和外史论的长期论争, 使不少科学史家认识到内史和外史的互补性, 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科学史, 主张内史和外史统一的综合史。1981 年召开的第 16 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 安吉拉·博载斯等人明确提出科学史的系统观, 主张用系统方法分析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科学。这时的科学史家多是“多面手”, 他们不仅研究科学本身的发展史, 也重视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既立足于科学反思科学, 又立足于社会、经济、历史和哲学审视科学。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兼社会学家保罗·弗曼极力主张科学史超越单一的内史和单一的外史, 主张二者的有机结合的综合史, 并认为综合史是科学史发展的方向。可以预见, 科学的综合化、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必将引起科学史的综合化, 21 世纪必将是综合史的时代。

4-5

库恩的位置

N02

万 丹
 (武汉大学)

纵观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 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科学史家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若将这一发展视为一条轨迹, 而非印记的堆积, 我认为应将库恩做为一个醒目的坐标原点。

其一, 库恩是科学哲学进行社会学转向的标志人物。

科学哲学在本世纪初由于较成熟的哲学派别“维也纳小组”的出现而较充分地显露出其特点: 注重证明的逻辑, 注重经验材料, 注重语言分析。将科学哲学归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并不为过。波普尔指出经验证明逻辑的缺陷, 汉森更提出“理论负载”的观念等等, 使逻辑实证主义走向式微。那么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为何? 六十年代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 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库恩的范式理论依据科学史实, 指出科学并非一个纯理性的过程: 从观察到理论选择, 直至范式转换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中, 科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科学共同体的共识等一直贯穿其中。知识不再仅指科学知识——真理的代名词。库恩所标识的社会学转向有两层含义: 一是知识的社会学。知识不再是纯理性真理的载体, 而包含了许多社会文化传统, 个人心理特质等的因素, 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二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科学知识丧失了其意识状态的地位, 具有相对性。后继的哲学家将此点扩大泛化, 甚至把科学知识与一切非科学的信念系统等量齐观, 以至于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对库恩的赞同和批驳, 成